

◀ (上接4版)

这就是机械论式的物理学方法。科学史上，哥白尼发表《天球运行论》的1543年是划分中世纪与近代的关键年份，从那时起到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这期间，伽利略的新运动观、对于力的概念的认知以及他的实验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虽然在伽利略看来实验并不是为了发现全新的现象而是为了验证推理的结果。到了培根那里，获取知识的方法得到了系统论述，通过实验、经验论与理性论之间建立了联系。而笛卡尔的贡献则在于开创了机械论哲学，同时他也阐释了“普遍数学”的原则，将科学数学化（爱德华·杨·戴克斯特豪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78页）。此外，波义尔、伽桑狄以及我们所熟知的霍布斯，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建设者。牛顿完成了伟大的综合，在他这里，17世纪科学革命的两大主题——试图解释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机制”的机械论哲学与试图对现象进行精确的数学“秩序”建构的努力统一起来，并且牛顿进一步明确了实际的自然和我们感官所描述的现象有所不同，不能指望科学了解事物的本质，“物理学旨在以定量方式精确地描述运动现象”（理查德·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张卜天译，第188页）。

牛顿物理学的重要遗产就是这一幅机械论式的世界图景，“机制”和“秩序”是这一图景中最重要的特征。这种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深深影响了此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中“科学”的基本属性已经确定，此后又经过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到实证主义等社会科学思想自身的发展。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中，哈耶克不满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到社会科学研究，其中所界定的自然科学的特征仍是这幅图景——科学最重要的是日益摆脱人们的感官刺激物，直到完全消失，科学世界可以仅仅被描述成一组规则，而最为恰当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

这种机械论物理学的图景逐步内化为社会科学自身的方略，其理论化的指导原则集中体现在实证主义上。实证主义是一个影响很大但所指却并不清晰的概念，一般是将其创始归之于孔德或者其老师圣西门。实证主义形成了诸多各异的学说，到了20世纪又有了所谓的新实证主义，鲁道夫·哈勒在《新实证主义》中总结过实证主义的四项基本特征：(1)只有，而且只能有一种实在，即感官可以把握的个体

对象；(2)只承认感官经验为人类认识的源泉；(3)知识统一性和科学统一性的假设；(4)价值判断被驱逐出知识范围。这些实证主义的信条被广泛运用到了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分析中。实证主义激进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猛烈的争论，1961、1964和1968年，联邦德国先后召开了三次社会学家代表大会，阿多诺和波普尔等人围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德国实证主义论战”，被视为当代人本主义思潮和当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典型之争。

诸多思想家受到这种争论的影响而重新思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哈贝马斯通过梳理思想史，借助在亚里士多德处的关于科学（知识，episteme, science）与实践智慧（明智、审慎，phronesis, prudence）的区别，重申在古典思想中，政治学是严格地在实践中的。现代政治学中这种“把科学判断的方法运用于实际的机智上”的大胆行动，是由马基雅维利和莫尔共同开创的——“他们研究的都不是实践问题，而是手段或技术问题。他们所设计的模式，即他们研究的新领域，都是在假想的条件下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第57—58页）到圣西门建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时，心中已经没有“实践”的维度了。“理论转变为实践，不再是理论研究的事。”实证主义打破了对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追求，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才又一次将实践引入理论。哈贝马斯对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分离的批判，其实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有两个环节——既展示了理想世界的物理学，又探讨了在实验和观测的外部世界中对理想定律加以修正的方式（《互动》，第54页）。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模仿了这种方法，但后来的政治学研究者似乎很少注意后一个环节。

从15世纪到今天，自然科学对政治学的影响是一幅略显模糊且不断演变的图景。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通行的教科书中，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科学被毫无疑问地确定为始于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的建立。这种学科史的书写颇有趣味，显然，现代政治科学并不愿意将其“科学”的部分归诸对历史的继承，而认为另有来处。在多萝西·罗斯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等译，三联书店，2019年）中，详细描述了美国社会科学中的“科学”的独特意味，美国政治科学的目标起源于美国例外论和对于历史的不确定性的克服，政治科学中的科学冲动，使得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政治事件中独立出来，寻求为治国术提供一般原则，进而演化

成一种自然科学模式的政治分析。漫长的政治学学科史的演变过程与同时代欧洲学界的各种争论，美国的政治科学界似乎都未深度介入，在这里，政治学最终致力于成为一门不甚精确但却具有普世特征的科学。

**在** 政治学界常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今天的政治科学研究者似乎从不把马基雅维利或者哈林顿当作同路人，在他们看来，这些古人所从事的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政治哲学研究；而今天的政治哲学研究者在埋头经典的同时，也几乎不会关注那些定量研究方法的进展，在他们看来，这些数理模型与人的本质毫无关系。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对科学的追求来看，霍布斯、边沁这类的政治思想家与今天做定量研究的政治科学研究者倒是更具亲缘性，其中的“科学”精神也一脉相承，同属于近代的“科学”。虽然看似科学“程度”越来越高，但从本质而言，今天最为先进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模仿的仍是牛顿力学为典范的数理模型的建构。甚至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基本图景似乎被“锁定”在17世纪。今天的政治学则完全没有跟上自然科学发展的步伐，天文学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特别是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及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这些20世纪自然科学所展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似乎并未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更没有激起社会科学潮流的转向。

不过，虽然没有根本研究范式的更迭，但当今有一项技术的进步值得关注，这就是大数据技术，这种依托于计算机的能级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应用技术的巨大进步，或许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建构“政治算术”的梦想。统计学是一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约翰·格劳恩特与格雷戈里·金就曾试图用各种方式获得统计数据，并希望以此来研究政治经济问题，甚至建构一种以数为基础的国家科学。与当时简陋的计算方法相比，今天这种超乎想象的计算能级必然能激起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相信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者也将投身其中。毕竟，与在社会科学的论文中精心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去揭示某个无关宏旨的因果机制相比，直接去研究大数据技术与国家治理术，或许才是真正继承了17世纪那些百科全书式人物的雄心壮志——不计后果、无所畏惧的追求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 伊朗之前 波斯之后

1935年前后的  
考古美术往事

邵学成



苏萨遗址博物馆的彩釉浮雕

在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联展”的展览中，伊朗15件文物第一次借调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展览实物的方式展现了伊朗的文明历史，同时展出的还有中国和日本的丝绸之路相关文物，中国观众也有了亲密接触亚洲文明和异域文化的机会。2020年冬春之交，我们前往伊朗进行了一次为期5周的环伊朗考察，在伊朗文化遗产旅游部和德黑兰大学师友帮助下，先后考察了17个世界文化遗产和近百个考古遗址及文博机构，走在这些古代遗址上，睹物思人，也回想起一些学界往事。

无论学界还是民间，我们常常以波斯称呼伊朗，伊朗足球被称为“波斯铁骑”、伊朗地毯被称为“波斯地毯”，还有波斯猫、波斯音乐，波斯一词好像就是带着异域风情，让人浮想联翩。实际上，波斯是指以现代伊朗为中心建立的古代国家，一般是阿契美尼德、帕提亚、萨珊三个古代王朝的总称，伊朗国名的由来则是现代的一次更改国名。

我们对于波斯考古美术和宗教文化的认识也是从中国的民国政府时期开始，但当时由于交通道路隔绝，两国忙于各自民族解放事务，也都在“全盘西化”和“托古改制”的思潮中踌躇，并没有太多直接交集。

作为文化复兴和民族精神再发现的重要一环，恺加王朝（1796—1925）的纳赛尔·丁·沙阿见证了伊朗考古研究的开端，法国考古学成了伊朗学习的重要对象。伊朗自身的考古学开启也是在法国Marcel-Auguste Dieulafoy与Jane Dieulafoy夫妇组织的苏萨发掘调查开始，陆续在这里发现了阿契美尼德之前的埃兰文化等，Roman Girshman在二战后的继续发掘，明确了公元前3000年之后的文化地层，苏萨也成为了伊朗考古的标准地层遗迹。

民国时期，尽管两国之间还未正式建交，但已经有了一些关于伊朗文化的译介，我们可以从江绍原的翻译事例来窥探。从1932年2月3日开始，《世界日报》连载江绍原博士翻译的《古波斯宗教》[Dr. Edvard Lehmann (1862—1930)，原著收录于Lehrbuch der

Religionsgeschichte (1897, Freiburg)节选翻译]一书，里面介绍了波斯的宗教文化历史，这也是当时世界各国的宗教学通用教材。曾经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狂飙突进的江绍原在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以比较宗教学研究为己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任教，也与鲁迅等人交好。

在序言中，江绍原还提到：“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第四册古代中国于伊斯兰之交通，关于我国文籍所载波斯宗教情形及祆教在华的出现和消亡，我现在无暇详考。张所云陈圆庵《火祆教入中国考》专书，尚未见。”

对于中国古籍文献中涉及波斯宗教的研究，陈垣除《火祆教入中国考》，也陆续写出《摩尼教入华考》《回教入华史略》等专文，推动了对于波斯宗教文化的认识。但受困于时代限制，当时国内学人很难走进丝绸之路上的国家进行实地考证。

1935年驻日本公使蒋作宾给民国政府发来电报信息，称波斯在3月21日通告全世界，已经改名伊朗：“本国国名将由波斯改为伊朗，以希腊文Persia系由Pars而来，即本国南部之旧省会也，若以此而代国名，似欠合理，且自昔迄今，本国即以伊朗自称。”（北京市档案馆J1-1-144）当时外交部长汪兆铭迅速通电给全国各级政府改名之事，伊朗的国名从此走进中国。

这时的伊朗在经历了1925年的政变后，新成立的巴列维王朝（1925—1979）继续推进西化政策。1935年，伊朗政府也委托法国学者主持设计并建立了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以考古发掘物为基础进行科学馆藏陈列，正式展出了伊朗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以考古发现构筑了伊朗的通史陈列。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展览的文物也来自这里，我们到来时这里的馆长Dr. Jebrael Nokandeh已经对中国很熟悉，在这座仿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拉克泰西封宫殿建筑中，馆长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他在中国的见闻，看到的受伊朗古代文化影响的文物古迹，对于中国的认识似乎在重新开始。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